

陕西出土宋元时期陶瓷枕研究*

刘 辉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西 太原市 030006)

关键词: 陕西地区; 宋元时期; 陶瓷枕; 分期; 产地

摘要: 陕西出土宋元时期陶瓷枕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 包括青釉、白釉、绿釉和多色釉, 可分为长方形、圆形、六边形、八边形和人形等。本文以具有纪年意义的考古材料为基础, 着重对陶瓷枕年代进行了考证, 并将其发展演变划分为四期。通过与现有窑址标本的对比, 大致分析了其区域产地, 本地产品以黄堡耀州窑为主, 外地产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外地陶瓷枕的运输方式应该是水陆并存, 并且优先选择水路运输。

Keywords: Shaanxi;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eramic pillows; periodization; provenance

Abstract: Ceramic pillow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unearthed in Shaanxi hav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celadon, white, green and polychrome glazes and rectangular, circular, hexagonal, octagonal and figural shapes. In the light of dated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evidence, this article particularly examines the dates of the ceramic pillows, and periodiz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nto four phases. On the basis of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existing kiln sit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provenance of the ceramic pillows are basically identified. Locally produced ceramic pillows were primarily from the Yaozhou kiln at Huangbao, while non-local ceramic pillows came from Shanxi, Henan and other regions. The transportation of non-local ceramic pillows likely relied on both land and water routes, with waterway transport preferred.

一、前言

我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在宋元时期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 陶瓷枕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更是达到极盛, 尤以北方地区最为流行。目前陕西出土宋元时期的陶瓷枕主要发现于西安、咸阳、宝鸡、韩城、榆林、延安等地墓葬, 铜川、宝鸡、渭南等地相关遗址也有出土, 数量虽不及山西、河南等周邻区域, 但仍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然而, 关于陕西宋元陶瓷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耀州窑^[1], 而陶瓷枕具体类型、年代与产地等基本问题仍需进行系统梳理与细致分析, 且可再讨论陶瓷枕在陕西的流通分布、出土比例和发展

变化, 以便完善宋元时期陶瓷枕的类型体系和编年序列。

二、类型与年代

通过对陕西出土宋元陶瓷枕的梳理, 发现可辨形制者共21件, 按釉色可分为青釉、白釉、绿釉和多色釉^[2]几类。

(一) 青釉

共4件。依据枕面形状的不同, 可分为三型。

A型: 1件。八边形。出土于宝鸡扶风县张家底墓, 枕面不出檐且下凹, 枕壁近垂直, 刻划花装饰, 长20.3、宽15.5、高8~10.8厘米^[3]。(图一, 1)枕壁刻划牡丹纹, 与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山西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 21CKG020)的阶段性成果。

西安蓝田县吕省山夫人墓出土青釉套盖盒外盖^[4]所饰纹样相同。

B型：2件。长方形。均发现于铜川^[5]。其中1件出土于铜川黄堡镇四中耀州窑遗址，枕面略出檐且下凹，两侧枕壁斜直内收，刻划花装饰，长27.5、宽13.2、高11.8厘米^[6]。（图一，2）枕面所饰缠枝莲纹、前枕壁所见游鸭纹分别和山西侯马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董氏墓出土青釉碗^[7]、重庆荣昌窖藏出土金代后期青釉碗^[8]的装饰纹样相仿。瓷枕整体造型又与铜川黄堡耀州窑址出土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款青釉枕残件^[9]相若。

C型：1件。六边形。铜川黄堡耀州窑址85 I T13②H29：7，枕面前缘内凹，枕壁斜内收，印花装饰，长16.6~25、宽9.2~18.2、高5.6厘米^[10]。（图一，3）发掘报告将该枕年代定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1086~1142年）^[11]，不过报告中还指出“南宋和金代又新出现了腰形枕和六棱腹枕等新的造型”^[12]。其枕面、后枕壁模印缠枝梅花纹，与山西大同云中大学M1出土青釉碗^[13]的装饰图案十分相似，后者形制又与相距5米的金海陵王正隆四年

（1159年）陈庆夫妇墓出土青釉碗相若。其余枕壁模印折枝牡丹纹，与北京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乌古论窝论墓出土青釉碗^[14]所饰纹样相似，瓷枕同出青釉擂钵（H29：3）^[15]与私人收藏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款青釉碗^[16]基本相同。

（二）白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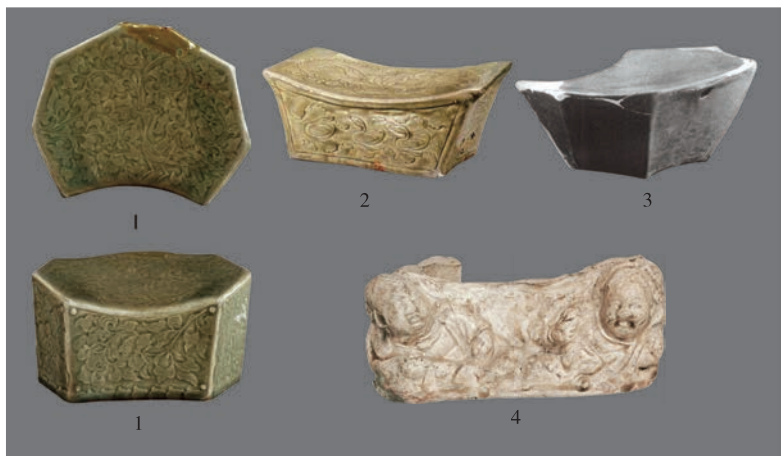
共8件，依据枕面形状及枕体的差异，可分为六型。

A型：1件。腰圆形。出土于西安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枕面出檐，枕底出边，彩绘装饰，长22.3、宽19、高10厘米^[17]。（图二，1）该墓还出土1件多色釉枕。两枕分别位于两具人骨头部附近，虽然未进行性别鉴定，不过多色釉枕底部有1枚银簪，故该白釉枕应为男墓主人段继荣的随葬品。据墓志记载，段继荣生于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卒并葬于蒙古宪宗（蒙哥汗）二年（1252年）^[18]。

B型：1件。圆形。出土于韩城安居寨村僧群墓，枕面不出檐，枕壁斜内收且微弧，枕面采用珍珠地划花装饰，枕底墨书“大定十六年”（1176年），长25.5、宽24.3、高9~11.5厘米^[19]。（图二，2）

C型：3件。八边形。可分为二亚型。

Ca型：1件。枕面略出檐且前缘内凹，枕面八角尤其是后缘的折角不太明显。出土于咸阳瑞祥小区墓葬，刻划花装饰，长26~33、宽14.2~16.5、高8.6~15厘米^[20]。（图二，3）发掘者判断该墓葬为金代早期，据所出55枚正隆元宝可知，墓葬年代不早于金海陵王正隆三



图一 陕西宋元时期青釉枕

1. A型（宝鸡扶风县张家底墓） 2. B型（铜川黄堡镇四中耀州窑遗址） 3. C型（铜川黄堡耀州窑址85 I T13②H29：7） 4. 人形（铜川立地坡窑址02LDW采：10）

年(1158年)。该枕与山西侯马乔村M482出土白釉枕^[21]形制相同,后者伴出“泰和”(1201~1208年)款白釉盘。同出陶釜与西安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潘顺夫妇墓^[22]、西安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李居柔墓^[23]出土同类器物相近。

Cb型:2件。枕面出檐且前缘略内凹,枕面八角较明显。发现于西安、韩城^[24]。其中1件出土于西安附近,剔花(填黑彩)装饰,长45、宽18、高11.5厘米^[25]。(图二,4)该枕与山西河津固镇窑址金代中晚期四号作坊出土^[26]、深圳望野博物馆藏“贞祐”(1213~1217年)款^[27]白釉枕形制相同。

D型:1件。六边形。出土于西安玉祥门外墓葬,枕面出檐,刻划花装饰,长47.5、宽20、高13.6厘米^[28]。(图二,5)该墓年代为14世纪初^[29]。

E型:1件。长方形。西安沙坡新安机械厂出土^[30],枕面采用刻划花装饰,长33.5、宽16、高11厘米。(图二,6)该枕与山西曲沃曲村M6043出土白釉枕^[31]形制相同,后者伴出钧釉碗、白釉盘分别与山西大同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墓^[32]、山东济南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墓^[33]出土同类器物相若。

F型:1件。人形。出土于延安黄陵县墓葬,彩绘装饰,先模制人物大体轮廓并将背部修整为枕面,然后在相应部位施以赭黄色或白色化妆土,再墨绘人物细节和装饰图案,施釉后一次烧成,枕底墨书“大定十六年”(1176年),长46、宽12、高20厘米^[34]。(图二,7)

(三) 绿釉

1件。八边形。出土于铜川新区人民银



图二 陕西出土宋元时期白釉、绿釉枕

1. 白釉A型(西安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
2. 白釉B型(韩城安居寨村僧群墓)
3. 白釉Ca型(咸阳瑞祥小区墓葬)
4. 白釉Cb型(西安附近)
5. 白釉D型(西安玉祥门外墓葬)
6. 白釉E型(西安沙坡新安机械厂)
7. 白釉F型(延安黄陵县墓葬)
8. 绿釉八边形枕(铜川新区人民银行)

行，枕面略出檐且前缘近平直，各枕壁相接处呈凸棱状，枕面、枕壁分别采用刻划花和印花装饰，长24.6、宽13.8、高10.9厘米^[35]。

（图二，8）其整体造型与河南三门峡陕县化纤厂M2出土多色釉枕^[36]十分相近，后者伴出青釉三足炉与汉中略阳出土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款同类器物^[37]基本相同。

（四）多色釉

共8件，依据枕面形状及枕体的不同，可分为四型。

A型：3件。腰圆形。均发现于韩城^[38]。安吉寨出土1件多色釉枕，枕面略出檐，前缘近平直，后缘略外凸，枕面、枕壁分别采用剔花和印花装饰，长24、宽10、高8.5厘米^[39]。

（图三，1）其装饰风格与山西侯马牛村古城65H4M102出土多色釉枕^[40]相似，发掘者判断该墓年代介于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年）墓和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墓之间。

B型：2件。长方形。均发现于西安。西安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出土1件多色釉叶纹枕，刻划花装饰，长36、宽9、高10厘米^[41]。

（图三，2）据前文分析可知，该枕系段继荣之妻刘氏的随葬物品，其年代下限为二人合葬之年即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西安沙浮沱村墓葬所出1件多色釉朵花纹枕，刻划花装饰，长32.5、宽12~16、高10厘米^[42]。该墓同出陶三足炉、I式男俑分别与西安航天城墓葬^[43]、西安曲江缪家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袁贵安墓^[44]出土同类器物相像。

C型：2件。八边形。

出土于宝鸡、榆林^[45]。宝鸡凤翔南郊墓地枕M162：1，枕面略出檐且前缘微内凹，各枕壁相接处呈凸棱状。枕面、枕壁分别采用刻划花和印花装饰。长25.5、宽12.2、高8.2厘米^[46]。（图三，3）其形制风格与铜川新区人民银行出土绿釉八边形枕十分接近。

D型：1件。人形。出土于西安周至县玉竹村，刻划花装饰，长33、宽15、高16厘米^[47]。（图三，4）对于该枕的年代，学界存在北宋和金代等观点。其造型和山西长治襄垣县西故县村墓葬所出多色釉人形枕^[48]相似，后者伴出白釉腰圆形枕与河南三门峡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墓^[49]出土同类器物相近。

三、陶瓷枕产地

（一）本地窑场

以位于铜川市境内的耀州窑为代表，包括黄堡、立地坡、上店、陈炉、玉华和塔坡等窑场。其中，黄堡是唐至元代耀州窑的



图三 陕西出土宋元时期多色釉枕
1. A型（韩城安吉寨） 2. B型（西安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 3. C型（宝鸡凤翔南郊墓地M162：1） 4. D型（西安周至县玉竹村）

核心窑场，也是出土宋元时期陶瓷枕数量最多的窑址。有1件出土的立地坡窑址青釉枕面残件，另有1件采集的青釉人形枕（02LDW采：10）^[50]（图一，4）其与河南三门峡市技工学校M6出土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绿釉枕^[51]造型风格相若。此外，玉华窑遗址也发现少量青釉枕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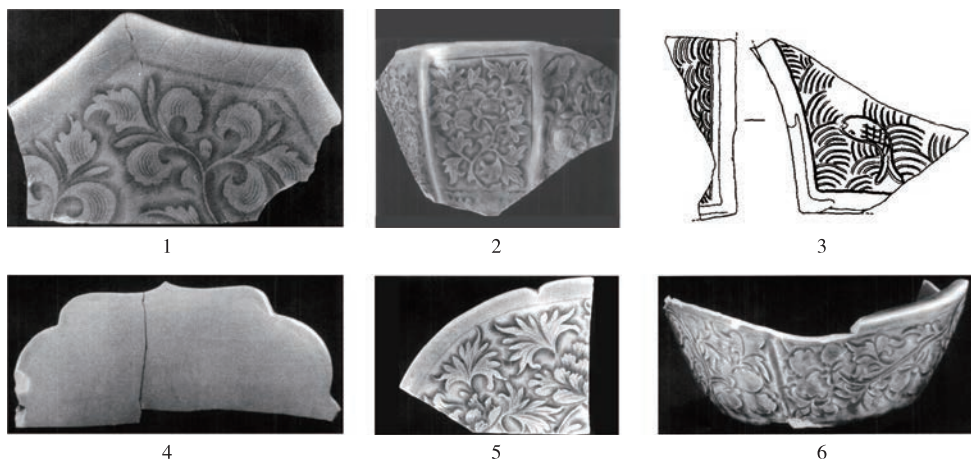
除了前述黄堡耀州窑遗址出土青釉B、C型枕等以外，扶风张家底墓所出青釉A型枕的枕面、枕壁则分别与黄堡窑址出土青釉枕残件（90VT28②：2、采：039）基本相同，（图四，1、2）故其也应为黄堡耀州窑产品。黄堡窑址出土青釉枕残件（86ⅡT5②：3），（图四，3）或也属于青釉B型枕。此外，窑址所出青釉枕面残件（84ⅠT6②：6）素面无纹，（图四，4）与山西长治沁源墓出土青釉人形枕^[52]的枕面形制相同，有研究者判断后者年代为北宋早中期（960~1063年）^[53]。黄堡窑址出土青釉枕残件（84ⅡT2④：1、85ⅠT13③：47），（图四，5、6）与日本静嘉堂美术馆藏枕^[54]的枕壁、枕面相似，有学者认为该类枕年代为北宋晚期或稍晚（11世纪80年代至12世纪40年代）^[55]。

（二）外地窑场

白釉B、Cb型枕分别与山西河津固镇窑遗址出土白釉枕（F4②：118、F4①：142）^[56]相近，（图五，1、2）绿釉八边形枕和多色釉A、C型枕的枕壁所饰十字锦花印纹与河津固镇窑遗址出土多色釉枕（F4①：118）^[57]相同，（图五，3）且绿釉八边形枕造型与后者相若。所以，它们均应产自山西河津固镇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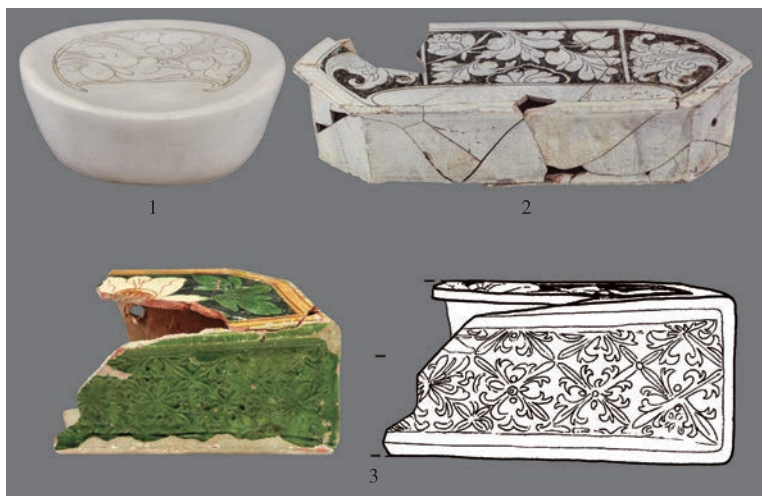
山西临汾窑址出土白釉枕标本^[58]虽较为残破，（图六，1、2）但从细节来看与白釉D、E型枕颇为相似。目前虽未发现可与白釉Ca型枕对比的窑址材料，但从其整体风格和山西临汾一带较多出土^[59]的情况来看，该亚型枕应产自山西窑场，并且很可能为临汾窑烧造。

段继荣夫妇墓出土多色釉B型枕曾被判定为北方磁州窑系^[60]、河南济源窑^[61]产品，但依据不明。不过河南禹州扒村窑采集标本^[62]和禹州钧台窑址出土标本^[63]可能与其造型、胎色更为接近，（图六，3、4）而且它们均随枕面形状刻划双线边框并施以黄釉。由是，多色釉B型枕应为河南禹州境内窑场产品。



图四 陕西黄堡耀州窑青釉枕标本残件

1. 90VT28②：2 2. 采：039 3. 86ⅡT5②：3 4. 84ⅠT6②：6 5. 84ⅡT2④：1 6. 85ⅠT13③：47
（1-6. 采自注释[10]图版七二；3、图版七一；6、图一三四；2、图版七〇；3、图版七一；1、图版七〇；4）



图五 山西河津固镇窑出土陶瓷枕标本
1. F4②: 118 2. F4①: 142 3. F4①: 118

段继荣夫妇墓出土白釉A型枕被判定为磁州窑类型^[64]，其枕面墨绘四道粗细相当的细线边框（内、外各两道），间饰辅助纹样，与磁州窑博物馆藏数件磁州窑“张家造”白釉彩绘枕^[65]造型相近，但后者枕面皆为外二内三的五道细线边框。故宫博物院藏磁州窑白釉枕面残片^[66]虽为四道边框，然外侧是两道粗线。而扒村窑采集枕面残片^[67]（图六，5）则与段继荣夫妇墓出土白釉A型枕的边框样式一致，且中间两道边框之间所饰辅助纹样等细节也更为接近。结合前文对该墓出土多色釉B型枕产地的判断，本文更倾向于同出的白釉A型枕也应产自河南禹州境内相关窑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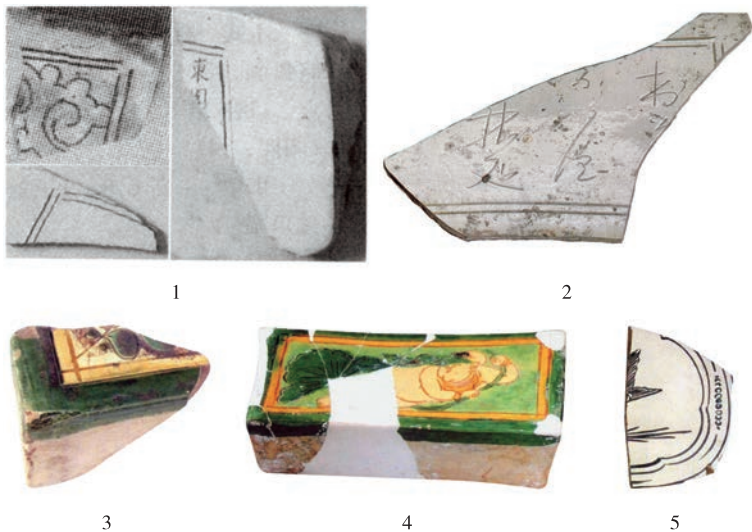
关于白釉F型枕的产地，存在河南扒村窑^[68]和山西长治窑^[69]等观点，多色釉D型枕也有河北磁州窑^[70]、河南扒村窑^[71]等多种认识，但受限于窑址标本而均依据不详。同样，本文初步推断二者分别产自山西长治窑与河

南中西部窑场，也需窑址新材料的检验。此外，见诸报道的渭南富平银沟遗址出土陶瓷枕，虽无法辨识形制，但从公布照片来看，应有产自河南中西部窑场的白釉枕残片，其中采用剔花和珍珠地划花装饰者^[72]，（图七）分别与大英博物馆藏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家国永安”铭白釉枕^[73]、北宋洛阳苗南村 I M4036出土白釉

枕（I M4036: 1）^[74]的纹样风格相同，有研究者判断后者分别产自鲁山段店窑和洛阳新安窑且后者年代大致为北宋晚期（11世纪80年代至12世纪20年代）^[75]。

四、发展与演变

陕西出土宋元时期陶瓷枕在数量、类型、分布范围、产地来源和装饰技法等方面均呈现一定的时代变化，可将其发展与演变分为四期。



图六 山西临汾窑及河南禹州窑陶瓷枕标本
1、2. 山西临汾窑出土 3、5. 河南禹州扒村窑采集 4. 河南禹州钧台窑出土

第一期：北宋早中期（960~1063年）。瓷枕出土数量不多，均为青釉枕残件，部分应属人形枕。主要发现于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以素面为主。

第二期：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1064~1149年），以北宋晚期（1064~1127年）为主。瓷枕出土数量有所增多，可见青釉、白釉枕残片，形制可辨者有青釉A型枕。主要出土于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在宝鸡和渭南也有发现。以黄堡耀州窑产品为主，在洛阳新安窑、鲁山段店窑等河南中西部窑场开始出现。可见刻划花、珍珠地划花、剔花等装饰技法。

第三期：金代中晚期至蒙哥汗时期（1150~1259年），以金代中晚期（1150~1234年）为主。瓷枕出土数量最多，可见青釉B、C型，白釉A、B、C、F型，绿釉八边形及多色釉A、B、C、D型枕等。分布范围也最为广泛，铜川、宝鸡、西安、韩城、咸阳、延安及榆林等地均有出土。本地产品仍以黄堡耀州窑为主，也有立地坡耀州窑烧造的青釉人形枕。外地产品主要来自山西河津窑，可能还有禹州窑等河南中西部窑场，以及山西临汾窑、长治窑。装饰技法丰富，可见刻划花、珍珠地划花、印花、绘花、剔花（填黑彩）等。

第四期：元世祖时期至元代灭亡（1260~1368年）。瓷枕出土数量有所减少，可见白釉D、E型和多色釉B型枕等。出土范围明显缩小，主要发现于西安。只见外地产品，以山西临汾窑和河南禹州窑为主。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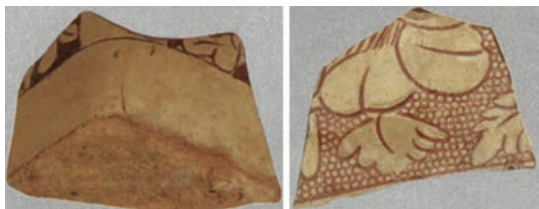
刻划花等装饰技法。

五、结 语

陕西出土宋元时期陶瓷枕主要发现于墓葬和遗址中，该时期出土陶瓷器的窖藏^[76]中目前尚无发现。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在西安、咸阳、铜川、宝鸡、韩城、延安和榆林等关中、陕北地区均有出土，陕南地区暂未有明确发现^[77]。陶瓷枕釉色可见青釉、白釉、绿釉和多色釉，包括八边形、六边形、长方形、腰圆形、圆形和人形等类型。

耀州窑产品牢牢占据着陕西青釉枕市场，主要出现于铜川、宝鸡和渭南。随着黄堡耀州窑的衰落，蒙元时期基本不见青釉枕。金代中晚期是山西河津窑的盛烧期，其白釉、绿釉及多色釉枕开始进入陕西，出现于韩城、西安、铜川和榆林等地，采用珍珠地划花、绘花、剔花（填黑彩）、印花等装饰。山西临汾窑陶瓷枕均为白釉，可能出现于金代中晚期而流行于元代，主要发现于西安、咸阳，采用刻划花等技法。河南中西部窑场产品在北宋晚期有少量发现，以白釉为主，可见剔花、珍珠地划花等装饰，主要发现于渭南；金代中晚期至元代可见多色釉、白釉，主要出土于西安，采用刻划花、彩绘等装饰。

至于外地窑场陶瓷枕的运输方式，应当是水路和陆路并存。虽然宋元时期的黄河、渭水航道不再承担漕运关东粟以给食关中的任务，不过“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达京师……”^[78]，可见对河、渭航道的利用在当时仍然普遍^[79]。紧邻黄河的山西河津窑、河南新安窑可分别通过龙门、西沃等渡口进入黄河航道，而不直接毗邻黄河的山西临汾窑、河南禹州窑也可分别利用临近的汾河、惠民河等水路至黄河，再转渭河航道抵达陕西各地。山西长治窑、河南鲁



图七 富平银沟遗址白釉枕残片

山窑所临河流与黄河并不直接贯通，因此其很可能先通过陆路到达黄河或其支流，再采用水运输入陕西。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期黄河下游河床淤积严重而决溢频繁，金代治河以防御为主，元代河患之剧烈超过以前各代^[80]，加上很难克服的三门峡“天险”，也会导致舟运困难^[81]。因此，在水路无法正常运输时，宋元时期发达的道路交通网^[82]便成为这些窑场产品通过陆路抵达陕西的保障。《万历野获编》就有陆路运输瓷器的详细记载^[83]，想必这应不是明代首创，或在制瓷手工业全面繁荣的宋元时期就已存在。不过从运输成本差异^[84]和瓷器易碎性来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水运肯定会被优先选择。

- [1] a. 董彩琪. 耀州窑陶瓷枕浅论 // 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5: 113~117.
b. 杜文. 碧玉妆成: 宋金耀州窑青釉刻印花枕与孩子枕. 收藏家, 2018, (7).
- [2] 由于同一件低温铅釉枕在不同研究者的描述中存在双色釉、三彩釉等称谓, 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本文将单色釉以外统称为多色釉。
- [3] a. 罗西章. 扶风出土的古代瓷器. 文博, 1986, (4).
b. 同[1] b.
- [4] 发掘者推算墓主人卒并葬于1107年, 详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陕西历史博物馆. 蓝田吕氏家族墓园.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352.
- [5] 宋伯胤. 枕林拾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185.
- [6] 北京艺术博物馆. 中国耀州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206, 图166.
- [7] 赵光林, 张宁. 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 考古, 1979, (5).
- [8] a. 重庆市博物馆, 荣昌县文化馆. 重庆市荣昌县宋代窖藏瓷器 // 四川考古报告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409.
b. 张凯. 五代宋金耀州窑青瓷的考古学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2025: 49.
- [9] 同[1] b.
-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耀州窑博物馆. 宋代耀州窑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65, 图版七一: 5.
- [11] 据发掘者介绍, 耀州窑所在区域在北宋灭亡后, 被宋金交替占领, 直至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
- [12] 同[10]: 591.
- [13] 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 考古学报, 1992, (4).
- [1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 // 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59, 61.
- [15] 同[10]: 144.
- [16] 刘涛. 宋辽金纪年瓷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25.
- [1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 1958, (6).
- [18] 曾丽荣. 元《段继荣墓志》考释. 学理论, 2015, (27).
- [19] a. 任喜来, 呼林贵. 陕西韩城金代僧群墓. 文博, 1988, (1).
b. 陈红玲. 韩城藏陶瓷枕集赏. 收藏, 2016, (12).
- [20]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咸阳瑞祥小区发现的金墓. 文博, 2004, (5).
- [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乔村墓地: 1959~1996.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969.
- [22] 倪志俊, 韩国河, 程林泉. 西安市北郊金代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1, (6).
- [2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金代李居柔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7, (2).
- [24] 同[19] b.
- [25] 黄桂珍.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瓷枕选粹. 收藏界, 2006, (6).
-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津市文物局. 山西天津市固镇瓷窑址金代四号作坊发掘简报. 考古, 2019, (3).
- [27] 望野. 千年梦华: 中国古代陶瓷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76.
- [2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玉祥门外元代砖墓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 1956, (1).
- [29] 袁泉. 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 华夏考古, 2013, (3).
- [30] 运城博物馆. 山河相依 窑火辉映: 晋陕豫冀宋辽金元瓷艺.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 173.
- [31]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一曲村: 1980~1989: 第3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1114.

- [32] 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元代壁画墓. 文物季刊, 1993, (2).
- [33] 济南市文化局. 济南近年发现的元代砖雕壁画墓. 文物, 1992, (2).
- [34] a. 杨元生. 黄陵县发现一件金代瓷枕. 文博, 1986, (1).
b. 冀东山. 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 陶瓷器卷.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123, 图80.
- [35] 张汉文. 漆沮遗珍: 铜川市考古研究所藏文物精品.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5: 75.
- [36]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陕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陕县化纤厂宋墓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93, (4).
- [37] 汉中地区文化馆, 洛阳县文化馆. 陕西省略阳县出土的宋瓷. 文物, 1976, (11).
- [38] 同[19]b.
- [39] a. 杨培钧.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 陶瓷器.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102, 176, 图105.
b. 同[25].
- [40] 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侯马65H4M102金墓. 文物季刊, 1997, (4).
b. 张柏.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5: 山西.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88.
- [41] a. 同[17].
b. 杜文. 陕西出土的磁州窑类型陶瓷. 收藏, 2014, (21).
c. 关于段继荣夫妇墓出土多色釉叶纹枕尺寸还有长36、宽15.5、高13厘米一说, 详见本文注[25].
- [42] a. 王九刚, 李军辉. 西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2, (5).
b. 王冬华. 西安发现的磁州窑三彩器. 收藏界, 2012, (10).
- [43] 出土买地券上可辨识的年号有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 详见: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航天城元代墓葬发掘简报. 文博, 2016, (3).
- [4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曲江繆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16, (7).
- [45] 高雪. 陕西清涧县发现一件宋代瓷枕. 考古, 1987, (3).
- [4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陕西凤翔隋唐墓: 1983~199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220, 图一四九: 7, 彩版六: 5.
- [47] 同[41]b.
- [48] 刘岩. 山西襄垣西故县村金墓出土的几件瓷枕. 陶瓷考古通讯, 2015, (2).
- [49]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三门峡市化工厂两座金代砖雕墓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2015, (4).
- [50] 耀州窑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铜川市考古研究所. 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31, 122, 彩版三: 6.
- [51] 史智民, 贾永寿, 宁文阁. 三门峡市技工学校三座金墓发掘简报 // 三门峡文物考古与研究.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119.
- [52] 同[30]: 88.
- [53] 刘辉, 刘丹. 山西出土宋元时期陶瓷枕研究 // 边疆考古研究: 第34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235, 240.
- [54] a. 王兰芳. 耀瓷海外收藏一瞥. 收藏界, 2008, (12).
b. 黄凤昇, 段方. 耀州窑宫廷瓷赏析. 收藏家, 2009, (10).
- [55] 张凯. 五代宋金耀州窑青瓷的考古学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2025: 214, 224, 237.
- [56] 天津市文物保护服务中心,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天津窑磁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76, 86.
- [57] 同[26].
- [58] 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平阳古瓷窑调查. 考古与文物, 2005, (3).
b. 水既生. 中国陶瓷全集28: 山西陶磁.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图101.
- [59] 同[53]: 231~250.
- [60] 同[25].
- [61] 同[41]b.
- [62]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 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 河南卷: 下.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410, 图371, 图360.
- [63] 郭培育. 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 // 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49, 彩版九: 4.
- [64] 同[41]b.
- [65] 北京艺术博物馆. 中国古瓷窑大系: 中国磁州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 155, 161, 170.
- [66]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 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 河北卷.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6: 85.
- [67] 同[62]: 401, 图360.
- [68] 同[39]a.
- [69] 刘翔. 宋金时期山西陶瓷赏说. 收藏, 2021, (12).

- 2016: 385~389.
- b. 王冠宇, 江建新. 填空补白Ⅱ: 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19.
- c. 上海博物馆. 灼烁重现: 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集. 前揭书: 102~279.
- [48]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二二. 前揭书: 444.
- [49]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四九. 前揭书: 946.
- [50] 明实录: 英宗实录: 卷一六一. 前揭书: 3132.
- [51] 古湘, 陈柏泉. 介绍几件元、明青花瓷器. 文物, 1973, (12).
- [5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钟祥市博物馆. 梁庄王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彩版七三~七九.
- [53]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 武汉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妻墓发掘简报. 江汉考古, 2010, (2).
- [54] 张柏, 主编.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江西.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84, 185.
- [55] POPE J A.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1: 101-105.
- [56] 高宪平.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瓷器研究综述 // 王冠宇, 江建新. 填空补白Ⅱ: 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 前揭书: 423~437.
- (责任编辑: 刘亚玲)

(上接73页)

- [70] 同[25].
- [71] 同[41] b.
- [72] 陕西省文物勘探有限公司. 富平银沟遗址调查与勘探: 2012~2013.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 图版九四.
- [73] 陈馨. 大英博物馆收藏陶瓷枕. 收藏, 2014, (19).
- [74]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洛阳市苗南村两座宋墓发掘简报 // 洛阳考古: 总第8期.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60, 64.
- [75] 刘辉. 宋元时期陶瓷枕的考古学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14, 293, 301.
- [76] 魏女, 王小蒙. 泥火幻彩: 陕西古代瓷器.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180.
- [77] 据介绍, 汉中市出土1件褐黄釉“枕”, 不过其器身中部有一周缝隙, 似为子母口, 再结合通高1.8、长5厘米的尺寸, 本文认为该器物应不属于陶瓷枕, 详见: 汉中市博物馆. 汉中八里桥水库清理一座宋墓. 文博, 1989, (1).
- [78] 脱脱, 等. 宋史: 卷一百七十五: 食货上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251.
- [79] 王开. 陕西航运史.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7: 163.
- [80] 程有为. 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77.
- [81] 河南省交通厅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河南航运史.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157.
- [82] a.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4: 299~456.
b. 周成. 中国古代交通图典.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5: 10~17.
- [83]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万历野获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660.
- [84] “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 运租庸杂物等脚, 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 山阪处一百二十文. 车载一千斤、九百文. 黄河及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 上水十六文, 下水六文; 余水上十五文, 下五文(每百里百斤)……” 详见: 李隆基, 撰. 李林甫, 注. 大唐六典.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1: 72.
- (责任编辑: 王涵)